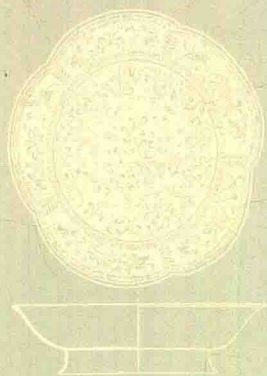


▽ 大家学术·主编 段渝

求证历史的印迹

冯汉骥考古学论集

冯汉骥·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大家学术一

求证历史的印迹

冯汉骥考古学论集

冯汉骥·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证历史的印迹:冯汉骥考古学论集 / 冯汉骥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5

(大家学术)

ISBN 978 - 7 - 108 - 06054 - 9

I. ①求… II. ①冯… III. ①考古学 - 文集

IV. ①K8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6716 号

责任编辑 王婧娅

封面设计 米 兰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毫米×900 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 数 149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弁言

李学勤*

日前听闻“大家学术”丛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即将付印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其对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些确实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做一推荐。

“大家学术”丛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渐升温的当口诞生的。我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时间里，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

弁
言

*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做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毕竟是继承并且创新的前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20年代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作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20世纪。比之清代，20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对20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20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20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中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学术”丛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受到欢迎。

这套丛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 20 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粹，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 20 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 20 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

于北京清华园

序

林 向

冯汉骥教授（1899—1977 年），是我国著名学者，是运用现代人类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兄弟民族的先驱者、人类学西南学派的开创者、西南地区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从 1931 年起，冯汉骥先生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从名师攻读人类学，1936 年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37 年 11 月他接受四川大学的聘请，任史学系教授，从此历 40 载春秋，辛勤治学，培育人才，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

1938 年，冯汉骥先生归国次年，他不顾抗日后方条件恶劣，全力以赴做了三件大事。一、开展民族考古调研：他只身赴岷江上游羌区进行民族调查，获取了大量民族调查资料，并在汶川萝卜寨亲自发掘了一座石棺葬（SLM1），这是首次在川西北山地获得第一手田野考古资料。其后他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为西南民族考古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二、开展专题考古研究：首次对西南常见的大石遗迹做了专题考古调查，他发表的《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一文认为“武丁担墩为人造之墩，极可能乃古坟，是以石笋可能为坟之墓石”；另些“独石”则是“纪念重要之社会、政治事件”的标志物；至于成都弥牟、双流、奉节鱼

序

001

复浦等地的“八阵图”实与诸葛亮无关，而是“可能具有宗教意义”的“列石遗迹”，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

三、开展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在他的策划与主持下，四川大学师生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对四川省境内的石器时代遗址及汉晋墓葬、壁画、石刻、造像等文物做了调查研究与收藏保护工作，搜集的数千件标本资料后来全部移交给四川省博物馆筹备处。为了全面掌握文物情况以便开展考古、博物馆事业，在一省境内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先生不时告诫我等后学：“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生善于抓住重要课题，锲而不舍地上下求索。1942—1943年，先生主持发掘成都西郊号称“抚琴台”的五代前蜀王建墓（永陵），这是国内首次发掘的帝王陵寝。它的发掘成功显示了先生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考古发掘技术，为先生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在此后的20年中，先生潜心科学研究，陆续发表《王建陵墓的发现与发掘》《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驾头考》《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王建墓内“大带”考》《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等一系列论著，为最后完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有关王建墓的论著与报告至今仍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必读文献。

先生对学术的执着敬业精神一以贯之。例如1944年，四川大学校园内发现一座已残破的小型唐墓，先生一丝不苟的清理工作保证了发掘资料的完整。他从朽坏的极细的银镯腔里取出一件唐代纸本雕版印刷品，上有佛像、经咒和“成都县”“龙池坊”“印买咒本”等字样，为我国印刷术的发明与唐代成都的历史文化地

位找到了极为珍贵的地下证据。

1951年西南博物院在重庆成立，先生出任副院长兼自然博物馆馆长，并亲自坐镇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田野考古工作。重要的发现有1954年配合成渝、宝成铁路建设在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发掘的一批战国秦汉间的“船棺葬”，用考古证据证明了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巴蜀文化”青铜器的真实性。1960年先生主持编撰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从此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巴蜀文化”“船棺葬”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采纳的考古术语。又如1953—1956年为配合砖瓦厂生产，在成都北郊羊子山清理出殷周时代的古蜀国三级夯土祭坛，底边长103米，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先秦单体礼仪建筑，为探索古蜀文明打开了新思路。笔者谨述从先生在四川大学攻研西南考古学时的一些亲知亲闻，以窥其精深治学之一斑。

一、“资阳人”的年代问题。1951年资阳黄鳝溪出土“资阳人”头骨化石。1972年有人根据事后采集的数据称与头骨同层的乌木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 7500 ± 30 年，因此认为“资阳人”头骨应属于全新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疑云纷起。先生1954年的手稿《关于资阳人的几个问题》公布后，结论就很清楚了。先生指出，头骨“已成为化石，而分量亦相当重，所以其年代还是相当久远的”，它是“从上游漂流至此”的，“离开了它的原始地层，则断代时只能考虑它本身的特质而不能再联系其共存物”。现在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观点，认为“资阳人”头骨的年代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序

二、“大溪文化”的命名问题。1962年我作为研究生，在导师冯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

掘报告》。报告经过仔细研究命名一种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联系而又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为“大溪文化”，其年代距今约6000年。1963年这本报告稿曾送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进行出版审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约我面谈，并细询冯师对我的指导与最新研究状况。可惜的是修改后的定稿本和全部图片、照片在“十年动乱”中不知去向，成了一大疑案。但是，“大溪文化”作为一个中国长江流域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采纳。

三、细心的观察研究，卓灼的科学预见。1963年先生率领四川大学师生与四川省博物馆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广汉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先生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很可能此处原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在此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证明了三星堆遗址群确是夏商时期古蜀国的都城，也证实了先生科学预见的卓识。又如，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长江流域史前文化高度发展、中原商代的白陶和原始瓷器来源于长江及长江以南的印纹硬陶等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绝不能局限于黄河流域。当1976年先生在病中看到公布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7000年前高度发展的稻作文化时，兴奋之状溢于言表。

四、鞠躬尽瘁，心血洒西南。1958—1959年先生两次应邀赴云南参加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撰写了大量的笔记、手稿，陆续发表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等文，是对考古新发现进行综合研究的范例。先生的文章综合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把考古资料、古典文献、民族学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对“滇文化”

和古滇人的历史、族属、礼制、俗尚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成为“滇文化”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而且是中国人类学西南学派在考古学领域的研究范本。1975年冬，先生抱病为从湖南、贵州前来求教的考古工作者做了有关夜郎问题的学术报告，从他自己对西南古代奴隶王国巴、蜀、滇的研究，谈到探索夜郎的思路和方法。谈者神采奕奕，听众心领神会，但会后先生即感不支，进入医院后便一病不起。不意该学术报告竟成为先生的“最后一课”。

冯汉骥先生的中外文著作众多，这里仅选印其中考古学方面的11篇论文以飨读者，若能让后学从中领略先生的风采之一斑，则幸甚焉。

目 录

001	序
001	关于资阳人的几个问题
011	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
025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
041	关于“楚公𠂔”戈的真伪并略论 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
048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079	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
096	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
104	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
130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
137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
172	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

关于资阳人的几个问题

“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的地层问题

资阳人头骨的发现，到现在已有三年多，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的确，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诚如翦伯赞先生所说：“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分布提出了新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资阳人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向人类学家提出的新问题。”^① 资阳人头骨发现之初，我个人曾予以密切的注意，头骨也曾在前西南博物馆展览过一段时期。因为当时缺乏研究仪器，除做了一些初步的形态学上的观察外，未曾予以研究。不过我觉得关于此一重要发现的具体出土情况和地层问题，对于以后的研究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想提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种化石的年代，主要是靠它所出土的地层和其本身的形态，再加与其伴出的其他生物化石来决定。因为我没有参加关于资阳

^① 翦伯赞：《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

002 人头骨的采集及后来的发掘工作，所以只能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推断。

求证历史的印迹——冯汉骥考古学论集

前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在关于成渝铁路筑路时的出土文物调查报告中，对黄鳊溪古生物化石、人类遗骨报告说：“（一）资阳黄鳊溪龙骨化石——第一批化石是西南铁路工程总局资阳工务段于1951年3月17日至21日在资阳县城西门外挖掘黄鳊溪大桥（铁路里程K148+395）至地面下8米（吴淞海拔352米）黑泥层内所发现。计：牙骨三件，脊椎骨六件，肢骨二十三件，尻骨一件，膝骨一件，爪骨一件，骨片二十三件，共五十八件，已由资阳工务段谭其芬段长亲身带往重庆西南铁路工程总局。第二批龙骨化石是从3月21日下午起到29日止，我组所收集的化石，计牙骨三十四件、角骨四件、脊椎骨二十二件，较大不明的骨类、化石三十五件，碎骨片六百五十九件，已由我组装箱运部。上述两批化石皆发现于黑土层中，仅有两颗白色牙化石，系在黄鳊溪桥另一桥墩基下所发现，其地无黑土层。……（二）人类遗骨——在黄鳊溪发现龙骨之地点，同时掘出头盖骨，此项骨类已变成土黄色，但尚未形成化石。已由谭段长带回重庆。”^① 资阳发掘后，在裴文中先生参加的西南博物院座谈会上，原重庆大学教授张圣奘先生介绍了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经过：“挖掘黄鳊溪一号桥基时，在桥东不远的8米深处，发现了一些象齿，即特别加以注意。16日在铁路工程（K148+395）处发现一个人骨化石，只有头盖骨及上颌骨两块，后来破为大小五块。我们当时悬赏数百元到1000元征求一个化石，其较大者赏额随之增加，并以10000

^① 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成渝铁路筑路当中出土文物调查报告》，《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11期。

元的赏额寻找下颌骨。附近化石收集了很多，但无人的颌骨。以后数日，继续注意收购，除部分动物化石外，再无其他人类化石发现。……总计在此处发现的化石共大小六百余件，内人类化石一个。还拾得两个半核桃和一包古树叶，作为参考的旁证。”^①由此可知，调查小组的报告并未注明头骨化石的确切发现地点，而张圣樊先生则认为在一号桥墩之东，以后资阳人发掘报告即采此说。不过据当时参加征集工作的原西南文教部王德云同志回忆：“人头骨漂在水中，由工人拾起，不能确定其是在什么地点掘出来的。拾起后，因工人互相争夺观看，致被扯成数片。”这也就是说，当时在场人所说的情况，各有不同，这种情形，我觉得值得发表，以供研究者参考。又，发现资阳人头骨的时间，张圣樊先生云在1951年3月16日，而调查报告则称在3月17日至21日之间，不知孰是？

至于资阳人头骨发现的地层，则情况更为复杂。据当时采集的人员说，头盖骨是在资阳黄鳊溪大桥第一号桥墩基下靠东约8米以下的地层中发现的。这不过是一种约略的估计。而实际是，仅仅8米深的地层，以西南靠近河床冲积地带而言，并不能代表时代的久暂。是后，又经过裴文中先生的试掘，地层的情况已比较明确了，但头盖骨是在何层中发现的，现在还是不能明确地肯定。

据裴文中先生的试掘简报，黄鳊溪发现人骨附近的地层，约可分为四层：

第一层（最上层亦即时代最近的一层）为红黄色黏土，平均约6米厚，大约相当于华北区的“黄土”。这一层内无化石或文化遗物。

^① 见《资阳发掘工作结论座谈会记录》，原西南博物院档案。

第二层为深灰色黏土，其中含有少量成层的细沙粒。此层厚约1米。此中含有大量已经腐烂了的有机物，所以颜色变成深灰或褐黑。

第三层为黄沙泥层，此层又可分上下两部。上部沙多，小砾石少，颜色深黄，里面保存有完好的树叶和大树干。据裴文中先生的推测，“人类头骨化石，可能是由这部掘出来的”。下部分沙愈少而粗，小砾石愈多，无大树干和树叶。此两部分均出骨化石碎段，几全为零星破碎者，且有为流水冲磨的痕迹。

第四层为砾石层，愈向下砾石愈大而砂愈少。此层内未发现骨化石或大树干。再下因未再向下掘，不得而知。^①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到底人头骨是在哪一层出土的？以现有事实来推断，蕴藏人骨化石的地层，不外乎第二层（深灰黏土层）和第三层（深黄沙砾层），因为只有这两层才出化石。据裴文中先生的推测，人骨化石是出在第三层的上部，即黄沙砾石层。不过据我个人的意见来看，这与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颜色是不相合的。按黄鳊溪所出的化石的颜色，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白色或浅黄色的，另一种是深灰色或褐黑色的。这两种化石显然是两种地层所出的，因为骨骼本身作白色，它带上的颜色，都是受土质颜色影响而来的。今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颜色是褐黑色（亦可称之为深灰色），就黄鳊溪地层土质颜色而论，可能是出土在第二层（即深灰黏土层），因为它与第三层（深黄沙砾层）的土质颜色是显然不合的。我不过只提出这一问题，但它的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再者，若人头骨化石是出在第二层，那么，对于它的时代的推断，则需要另行考虑。

^① 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3页。